



『孟子』

汉字学视域下的

何铁山 施杏姑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汉字学视域下的《孟子》

何铁山 施杏姑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学视域下的《孟子》/ 何铁山, 施杏姑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308-14812-2

I. ①汉… II. ①何… ②施… III. ①儒家 ②《孟子》—研究 IV. ①B22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1428 号

汉字学视域下的《孟子》

何铁山 施杏姑 著

责任编辑 傅百荣

封面设计 张忠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良渚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67 千

版印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4812-2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前 言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第一章》）荀子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对孟子大加挞伐，说其“材剧志大”，“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荀子·非十二子》）以导致“世俗之沟犹矜儒，嚙嚙然而不知其非。”（《荀子·性恶》）从而对后世造成了恶劣影响。司马迁则借梁惠王之名以言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话里话外，饱含讥讽揶揄之意。说白了，是表达了对于孟子思想迂腐却立意高远、雄辩却难以实践的某些不满。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则于其略带唯物论色彩的巨著《论衡》之中，专作《刺孟》一篇，对孟子进行了无情的批驳，说其：“失谦让之理”、“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前后不同”、“终始不一”、“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等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视《孟子》为邪说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与王充同为东汉时期的学者赵岐则称孟子“生有淑质”，赞其说为“法度之言”，“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遵君父，立忠信；守志砺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赵岐《孟子题辞》）似乎把孟子抬到了几与孔子同等的地位。其实，以上诸说，皆有洞见。细味之，且从真际言之，孟子之“道（学说或思想系统）”，确实有许多既不能合乎事理，也不能合乎逻辑，即既缺乏知性思维，也缺乏理性思维，与当代哲学、自然科学相去甚远。如其论“人性”，总是把“人性（human nature）”与“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混为一谈，便易为当

代哲人所诟病。但其孤傲的性格、不屈的意志、强烈的自信、舍我其谁的伟大精神，给人的感动与感悟，确能鼓舞人心、昂扬斗志，从而有助于我们成就事业，特别是精神境界的提升。故中华儿女，如欲继承弘扬传统国学之精神，便不能不读《孟子》。

本书作者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以“汉字学”为切入点，以“普遍怀疑”为基本治学态度，耗时三年余，对《孟子》十四篇给予字字细读，且对其中每一个略有疑问的汉字，都进行了近乎愚蠢的查阅、比较、探究，从而得出不少新解。读者诸君，如能静心品读，想必亦能得到某些新的启发与认知。

何铁山

2012-09-14

目 录

孟子及其思想简介	/ 1
与孟子商榷	/ 8
以“汉字学”入手研读古代经典之方法论意义	/ 21
别样的解读	/ 43
卷一 梁惠王上	/ 53
卷二 梁惠王下	/ 80
卷三 公孙丑上	/ 118
卷四 公孙丑下	/ 153
卷五 滕文公上	/ 179
卷六 滕文公下	/ 201
卷七 离娄上	/ 232
卷八 离娄下	/ 272
卷九 万章上	/ 306
卷十 万章下	/ 333
卷十一 告子上	/ 356
卷十二 告子下	/ 388
卷十三 尽心上	/ 417
卷十四 尽心下	/ 463
参考文献	/ 507

孟子及其思想简介

一、孟子其人

现在一般人知道孟子之名，大多可能是与“孟母三迁”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但经过“文革”的那一代，则可能是因为“孔孟”一词。近现代以来，孔子曾是国人反复批判的对象，孟子自然也不例外。“文革”时究竟批判“孔孟”什么？对于笔者，因少年懵懂，到现在还依稀记得的便只有一幅漫画上写着的“克己复礼”了。

关于孟子生平最早的正史记录应源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道即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宣王、威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通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百余字的记述十分简略，故孟子一生的详细情况必得借助于后世的其他研究资料以及《孟子》本身来得以了解。

孟子姓孟，是因为他是鲁国三桓之一孟孙氏之后。“轲”是孟子的名。他还有个字叫“子舆”。“邹人”是说他出生于“邹”。此“邹”，有说是邹国，有说是鲁国邹邑，其实说的都是一个地方。因为邹国后来为鲁国所吞并也就成为鲁国邹邑了。它位于今天山东的邹县。孟子生卒年代，根据资料不同，便有多种说法，有影响的主要有两种：一种为生于周烈王四年（前 372 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 289 年），享年 84 岁；另一种为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前 385 年），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前 304 年），享年 82 岁。至于他受业于子思门人（子思为孔子之孙，曾子的学生），游说诸侯，序《诗》、《书》，作《孟子》七篇等情况，司马

迁大概是说的差不多的。因为这些我们通过《孟子》本身也可以感觉或了解到。

根据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与刘向的《列女传》载，孟子幼年丧父，由母亲独自抚育成人。后世蒙书《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教子的故事便来源于此。“择邻处”便是“孟母三迁”。“断机杼”便是“断织教子”。

孟子的老师是谁？西汉司马迁说是子思的门人，东汉赵岐说是子思。细推之，司马迁之说较可信。这可以从《离娄下·第二十二章》中得到印证：“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说明其师并非如子思这样的名人。如是，孟子必会直言之。

孟子学成之后，便效法孔子招徒讲学。通过讲学，孟子宣传了主张，扩大了影响，成就了名声。孟子的弟子主要有：公孙丑、万章、公都子、高子、屋庐子、陈臻、陈代、充虞、徐辟、咸丘蒙、彭更、桃应等。这些人在《孟子》一书中均可找到，但其影响力却多远不及孔子的学生们。

仅仅靠讲学是不能实现自己的“王政”主张的。于是，孟子又效法孔子带领学生游说诸侯。从《孟子》的有关记述看，孟子游说诸侯确实不仅是为了邀官，而是要成为帝王之师，实现自己的王政理想。孟子出游的时间，我们今天已无法了解得十分具体。根据《孟子》及相关记述可以认为，第一次是其中年（40岁左右），第二次是其老年（50岁多些）。第一次大致是从邹出发，然后到达齐国、宋国，再返回邹。当时齐国国君为齐威王（前356—前321年在位）。到达齐国后，齐王想见他，他也想见齐王，可最后却由于孟子自视太高，又拘于王必得先求见于他的虚礼，而失之交臂。离开齐国时，齐王派人送其百金也不予接受。在宋国时，给宋偃王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此期间，小国滕国的世子却曾两次拜见过他。孟子给滕世子讲了“性善”与“尧舜之道”，滕世子对他很是佩服尊敬。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取道薛地回到邹国。第二次游说诸侯时，孟子已经是名声大噪，跟随的人也很多（“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参见《滕文公下·第四章》）。孟子先后到了滕国、魏国（即梁国）、齐国、鲁

国。在滕国，原来的滕国世子已成为滕文公，孟子的思想得到滕君的完全接受。在滕期间，孟子还与农家学派许行、陈相，墨家夷之发生过辩论。由于滕国太小，无法实现其王政理想，不久，他又到了魏国（因其首都在大梁，又称梁国），拜见了梁惠王（前 370—前 319 年在位）。与惠王进行了多次交谈后，两人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可惜的是惠王次年就去世了。接替的梁襄王，在孟子看来，根本就不像王的样子，于是孟子又离开了魏国。接着孟子第二次来到齐国，这年大致是公元前 318 年。齐国当时是齐宣王（前 320—前 302 年在位）当政。在此期间，孟子当上了齐国的客卿，齐王与孟子进行多次交谈，还发生了燕国王子哙禅位于丞相子之、齐国伐燕等重大历史事件。孟子在齐国伐燕的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前后矛盾的角色。齐国占领燕国后，对燕国进行了杀戮与掠夺，这使孟子很失望，于是孟子又转到了鲁国。在鲁国，由于小人的“阻挠”，孟子没有见到当时的鲁平公（前 314—前 296 年在位）。孟子自己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其实，根本原因不是小人不小人的“阻挠”问题，而是其思想的复古性与孤傲性格所决定。亦如司马迁所言：“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难以得到当时诸侯国君的重用。

晚年（70 岁左右），孟子回到邹地，与弟子万章等深研《诗》、《书》及孔子学说，总结自己主张，著《孟子》十一篇（或十四篇）及外书《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孟子》一书因得到东汉赵岐注释，便流传下来，其他因赵岐认为“其文不能弘深”，疑为他人假托之作，故弃之不注，便没有流传。孟子活了 84 岁左右，这在古代，可以说是十分长寿了。

二、孟子思想简介

孟子思想，如果用两个字加以概括，便是“复古”。“《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见《离娄上·第一章》）可见孟子所特别推崇的就是完全遵循先王旧法。这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但孔子一方面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另一方面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

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既主张要尊崇周朝政治礼仪制度，又认为在继承的基础上要有所损益，便比孟子要灵活一些。孟子则主张对周代政治经济制度全盘照抄（就是已经完全崩溃了的“井田制”也不例外），这便是孔子所认为的“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了。

孟子思想，如果用四个字加以概括，便是“内圣外王”（此语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其意义对于儒家来说便是：“内有圣人之德，外有王者之治。”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便可达到）。“内圣外王”，说白了就是“复古”的另说。“内圣”即是要求当权者把自己内心道德修炼得要像古时的“圣人”尧、舜、禹那样。“外王”即是要求当权者对百姓的统治要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对待百姓那样（即“王道仁政”。这种思想，后来遭到了来自法家代表韩非子的猛烈攻击，被认为是不明“势”，且不知“术”、“法”之用：“今学者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术）也。”）。

孟子思想，如果用 16 字概括，便是：“仁义礼智，求则得之。”“贤士治国，民贵君轻。”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人人皆具“仁义礼智”“四端”（参见本书《告子上·第六章》），故人人可以为尧舜。至于国家治理，则必得以贤士当位，以民为本，仁政爱民。

我们一般不会相信，仅靠孟子思想就能把国家治理好，但我们却可以相信或欣赏孟子思想具有强烈个性特征与感情色彩的部分，如：

“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如果认为践行仁德而不能得到依恃就拒绝践行，便是不明智的。”）

“仁也者，人也；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合而言之，道也。”（“所谓仁，就是让人成其为人；所谓义，就是要所行之事都是适宜的；所谓礼，就是要践履先贤的礼仪制度；所谓智，就是要知道应该知道的；所谓信，就是要诚实不欺。这些东西合起来就叫做合乎了道。”这跟《左传·鲁桓公六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异曲同工。）

“养心莫善于寡欲。”（“培养自己善良心性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适当地减少欲望。”）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之所以区别于一般人，主要在于他善于省视自己的内心，即不断地反省自己。”）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所谓道义，就是堂堂正正的大路；所谓礼制，就是堂堂正正的大门。只有堂堂君子能从这样的正路与大门出入。”）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自身不遵循道义行事，在妻子儿女面前都行不通。驱使别人不遵循道义，就是驱使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行。”）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仁德的语言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化深得民心。”）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追求学问的根本目标没有其他什么，只是不断地去努力寻求已经丢弃了的仁义本性而已。”）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君子的所作所为，没有比引导别人与自己一同行善更伟大的了。”）

“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不要做那些自己所不应当做的事，不要贪图那些自己所不应该贪图的东西，能做到这样就够了。”）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一个人不可以不知羞耻；不知道羞耻的羞耻，才是真正的无耻啊。”）

“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谦恭的人不会侮辱轻慢别人，俭朴的人不会掠夺别人。”）

“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一个人可能有不能预料的荣誉，也可能有因追求完美（或求全责备）而惹来的诽谤。”）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改正错误。也只有心智受到困扰，思虑横遭堵塞，然后才能愤发而起；这一切的经历会显露在脸上

上,表达在语言中,最后就能为人所了解。一个国家,如果内没有依法行政且敢于指出君上错误的直臣,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更容易亡国。由此可以推知,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易使人败亡。”)

“君子不亮,恶乎执?”(“君子不讲诚信,怎么可能有所持守呢?”)

“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喜欢揭发别人之隐私,当如何应对由此而带来的祸患呢?”)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做人最大的忧虑或担心,在于喜欢当别人的老师。”)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解说,目的是要能反过来实现最简明扼要的解说。”)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真正的伟大人物,其所说的话,不一定有预期的诚信,其所采取的行动,也不一定就有预期的结果,他只是依据道义行事而已。”)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人因为放弃了不干某些事情,然后才可能有所作为。”)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道,就在我们身边,但要真正寻求到,却需要追求很长一段过程;事情,本来容易,但要真正寻求到容易做好的方法,却需要一段艰难曲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百姓最为重要,社稷在其次,君主最轻。”)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愿意分享百姓们的快乐,百姓们也会愿意分享他的快乐。愿意分担百姓们的忧愁,百姓们也会愿意分担他的忧愁。因为天下人的快乐而快乐,因为天下人的忧愁而忧愁。”)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占得天时不如拥有地利,占得地利又不及拥有人和。……顺应规律、尊崇正义,帮助他的便多,背道弃义,帮助他的便少。”)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天下政治清明、道德伦理秩序井然,君子便以道作为保卫自身及天下百姓的工具;天下政治黑暗、道德沦丧、秩序混乱,君子仁人志士便

会为好的政治局面的重新实现而愿意舍弃生命。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公平、正义、道德伦理会因为人的政治黑暗而被消灭。”)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得志时，便与老百姓一起踏着这条道路前进；不得志时，便独自遵照自己内心认可的理念行事。高官厚禄不能乱其心性，家贫位卑不能改变其行为，强势威逼不能挫败其意志。只有这样的人，才可称得上是大丈夫。”))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有志之士，即或沦落沟壑之中，也不会忘记自己作为志士所应当坚守的理想、信念；真正的勇士即或丢掉脑袋，也不会忘记自己作为勇士所应当坚守的理想、信念。”))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称一称，就能知道物体的轻重；量一量，就能知道物体的长短。事物总是这样的，人心就更清楚了。”))

等等，将会永远在人类思想史上显耀夺目光辉！

何铁山

2012-09-13

与孟子商榷

(绪论一)

在《滕文公下·第九章》中，孟子的学生公都子曾质疑孟子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方面直接否定了自己好辩，另一方面又称其之所以得“好辩”之名，皆因要应付“杨、墨”之淫辞邪说，欲传“圣人之道”而迫不得已。虽然不承认，但却否定不了其“好辩”的客观事实。即孟子不仅好辩，而且能辩、善辩、雄辩。我们在《孟子》一书中，至少可以找到两方面的证据：一是《孟子》四万余言，其中动则“子曰”、“《诗》云”、“《书》云”、“《礼》云”，洋洋洒洒，或博引旁征，或故弄玄虚，或曲辞异说，常把对手驳得理屈辞穷、体不完肤、哑口无言。不是好辩，又是什么？二是孟子自云：“知言。”（《公孙丑上·第三章》）“知言”者，善于、擅长辨识语言之谓也。试想，如不“好”之，岂能“知”之？故孟子之“好辩”，“外人”所言不虚。当然，客观地说，孟子“好辩”之原因，或主要由客观环境因素所造成，但仍不能否定主观因素与天资的作用。一般人欲得“好辩”之名而不能，更何况能辩、善辩、雄辩哉！孟子不愿承认自己“好辩”，似另有隐情。窃以为，这或与孔子所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的“圣教”有关，或与老子所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第五十六章）的思想影响有关。

既然“好辩”，辩得多了，有时就难免会有曲辞异说、故弄玄虚、失之偏颇、举例不当、前后矛盾之嫌。下面略举数例，名之曰：“与孟子商榷”，实欲与古人“交友”，以求教于当世大方之家也。

一、曲辞异说，缺乏逻辑性

（一）齐王以牛“衅钟”，“不忍其觳觫”

在《惠王上·第六章》中，孟子以胡龁所叙齐王“衅钟”之事，来推论齐王既然“恩足以及禽兽”，就可以实现“功至于百姓”，而其过程与结果却都不具内在的必然逻辑性：

1. 齐王看到有人牵牛从堂下经过，要去以牛“衅钟”，便建议换之以羊，原因是他“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从此事的语境看，齐王要参加“衅钟”之礼是肯定的。但问题是，既然见不得牛之“觳觫”，难道就一定能见得羊之“觳觫”？或“若无罪而就死地”就“不忍其觳觫”，而“有罪而就死地”就“能忍其觳觫”？！这一方面说明齐王平时见惯了刑杀有罪之人之“觳觫”，只是对“无罪而就死地”之牛“不忍其觳觫”。可牛没有罪，羊同样没罪；牛会“觳觫”，羊同样会“觳觫”。这是常识。故以此可知，齐王之“以羊换牛”，或是一种一时的“心血来潮”，或确为惜牛而以大换小，或只是“作秀”，实与“觳觫”无关。

2. 齐王“以羊易牛”，孟子认为：“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有道理！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齐王因之前曾见过牛的“觳觫”，所以不忍，而没有见过羊的“觳觫”，所以要“以羊换牛”。但是，“以羊易牛”并不等于“恩足以及禽兽”，最多也只是“恩及一牛”罢了。因“衅钟”之事并未因“不忍其觳觫”而免之，“恩足以及禽兽”又何从谈起？

3. 就算齐王因“不忍其觳觫”、“见牛而未见羊”是有“仁术”而“恩足以及禽兽”，但也不能推导出他一定就可以“功”“至于百姓”。首先齐王是因为曾见过牛的“觳觫”，所以才有对牛的“不忍”之心，因没见过羊的“觳觫”，所以对羊就没有。照此逻辑，他如没有亲见百姓们的“觳觫”，若要其“功至于百姓”也就不能成立。再者，就算“以羊易牛”是“恩足以及禽兽”，也不能推导出他就能“保民而王”，“功至于百姓”。这就像今天，有那么些人，他们“爱一切动物”，且肯出钱出力为

一些临死之猫狗治病、送葬、呐喊、奔走，却不必然愿意“功至于百姓”一样。

4.“保民而王”、“功至于百姓”，对于齐王而言，绝非孟子所认为的如“举一羽”、“为长者折枝”可比。如其然，齐王本有“恻隐之心”，又“恩足以及禽兽”，“功”亦能“至于百姓”，也即齐王统一天下本来就“可运于掌上”，那么孟子的游说本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二）“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在《公孙丑下·第二章》中，孟子对于齐王想见又拒见的行为既酸且赖，实在让人“匪夷”。齐王感冒了，“不可以风”或并不是假，而孟子称病却是实在的虚假、做作。这种情况的发生，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或动机，皆有虚伪、不恭之嫌。齐王派医生来看他，他又躲进朋友家不回来，不仅作假，而且捉迷藏。朋友劝他，引出他一大套说辞，大意是自古大贤之人都会得到贤君的最高礼遇。这种以“礼”之名而“无礼”，实为戏弄君王于股掌之中。它一方面似为读书人在他的言论中长了脸，但也确实反映出孟子性格中的过于自尊、固执以至于自高自大的一面。这种矫情、强辩，即显其有才，亦失于敦厚（老子、孔子都是一贯反对强口利舌的。老子说：“大辩若讷”，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或许正是孟子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将自己成功“推销”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实中真正的大有作为之当权者，是不会在乎你“端起”，且亦可能帮你“端起”，但绝不可能喜欢你的“端起”。孟子最佩服孔子，把管仲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公孙丑下·第二章》），又认为“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上·第十一章》）可是，仅从本章看，孟子的言行，不但狭隘，而且不恭，根本不能与古之君子相提并论。难道为了所谓子虚乌有的“礼”或“面子”而“端起”，就连孔子的嘉言懿行都不遵循，也是“不得已”吗？

（三）“劝齐伐燕，有诸？”

在《公孙丑下·第八章》中，孟子从事前回答齐国大臣沈同：燕可伐。到事后解释：“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即又认为齐国不可伐燕。

接着，孟子虽然又说了一大套理由，但仍可视之为开脱自己责任的诡辩之辞。沈同是齐之大臣，虽以“私”见孟子，但他并未抛弃齐之大臣的身份。此其一。其次，当时周已衰微，“礼乐征伐”早已从诸侯出，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战，天下大乱，离燕最近且力量强大的只有齐国。其三，齐出兵不到五十日便获全胜，即是“如有天助”的结果。如齐人不伐，难道要让远隔千山万水的秦与楚来伐不成？其实，“天吏”之说，或有“礼”作依据，但深究之，乃孟子自欺欺人。其四，国家间的战争又怎可以与所谓“士师”杀人相提并论？再者，裁判国家间对与错的“士师”又在哪里？士师杀人可以法，而国家之间即或有法可依，又岂能敌得过“弱国无外交”、“强权即公理”“正义的标准总是以同等强力为基础的。强者可以做其有权力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接受其必须接受的一切。”（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现实。

二、故弄玄虚，偷换概念

（一）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

在《滕文公上·第五章》中，有段孟子与陈相的论争，孟子的话语明显有强词夺理，偷换概念之嫌。陈相说：“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有错吗？可是经孟子一解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似乎陈相全错了！可是只要认真一分析，便会发现，陈相的错，都是孟子强加的！陈相在说“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的同时，并未说它们的质量一定不同、大小一定相同啊。如只讲长短、轻重、多寡，而不讲质量，那不就是“国中有伪”了吗？这不是说陈相在故意自打耳光吗？何其可笑！其实，陈相的“市贾不贰”与“国中无伪”是互为前提的，难道同样的东西、同样多少的数量与质量同价，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可惜，孟子为了驳倒陈相，竟然给他强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伪前提。